



近代中国史学述论

◎ 罗志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史学述论

◎ 罗志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史学述论 / 罗志田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303-18575-7

I. ①近… II. ①罗…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7281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JINDAI ZHONGGUO SHIXUE SHULU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60 mm × 230 mm

印张: 23.25

字数: 385 千字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谭徐锋 曹欣欣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王婉 责任印制: 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本书为四川大学 985 工程三期区域
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成果

自序

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我们今日实行的仿西式学术分科确立时间却不算长。不过，在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滥觞之际，章太炎、梁启超就已提出了类似今日所谓“跨学科研究”的主张。^①这一取向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更得到大力提倡^②，然而若从社会视角看，史学之下各子学科的畛域又还比较明显。譬如，各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现在大都“整合”为一科，但从课程的设置、学会的组成到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大体仍可见比较明晰的“边界”。

以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播电视一律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但各地的广播电台通常都有一定时段的方言节目（那时电视台甚少）；如今媒体讲究“煽情”，就连中央台都出现不少带有地方口音的主持人，但除民族语言外，各地的方言节目似乎都停歇了^③，却出现不少探讨“地方

① 章太炎在1902年说，“心理、社会、宗教各论”，皆能“发明天则”，故“于作史尤为要领”。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见《章太炎全集》（3），3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关于梁启超，参见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新6期。

② 台湾通常将这一取向表述为“科际整合”，其热情似已较大陆稍减，发展情形也不甚同，此所论基本只限于大陆的现象。

③ 我没有进行认真调查，据朋友说似乎粤语节目仍存在。粤语那保持自我因而也形成自我保护的“顽强”能力非常值得文化学者研究，前些年香港一般大学中，据说国语和英语都不甚通行，不会粤语的教师固然仍可教书，但与学生的沟通总有些问题；国语暂不论，这可是被英国据为殖民地一百多年的地方，在大学这样的社区里英语的势力范围尚如此有限，则其“殖民化”的成效大可思考。在美国，唐人街里迄今仍有更会说粤语而不太会说英语之人。在英语（转下页注）

特色”的话题和方言电视剧。类似的诡论现象史学也有：当政治史几乎成为史学的“普通话”时，各专门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层面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和着一些专门史的“方言”风味，然而各专门史的区分却较前更受关注，有的还存在着关于“什么是某某史”这类论题的持续探讨，其实就是一种希望进一步划出或划清学科“边界”的努力。

这方面比较明显的是社会史，近年处于上升地位的各专门史中，社会史应属比较成功的一科，而其画地为牢的正名意识也相对更强。历年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的综述中常见试图为“社会史”正名的论文，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只有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可以算得上“社会史”，否则便只能算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史学。^①其实即使是后者，也渐已形成某种大致众皆认可的认知，即应该以社群（通常隐约带有大众化的或反精英的意味）和特定范围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尽管近年“礼俗”和“生活”这类过去社会史的常规论题已渐溢出而有“独立”的势头了。

反之，思想史这一近年也处于上升地位的专门史^②，则表现出相对宽广的包容倾向，其一个特点是许多人往往将思想与文化连起来表述为“思想文化史”；唯就一般意义言，“文化”似较“思想”宽泛许多^③，前些年西方所谓“新文化史”更与通常所说的思想史大不相

（接上页注）里唐人街即 China town，美国民间日常口语中能说 Chinese 是指说粤语而不是说国语或普通话，后者不过是 Mandarin 而已。这一自然形成的“以偏概全”现象同样揭示出粤语那超强的自我保持能力。

① 各种相关看法可参见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载《历史研究》1997年1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3~21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②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现象，因为思想史在西方已呈明显的衰落趋势，台湾也开始出现类似的走向；而近年较多致力于“与国际接轨”的大陆学界，却表现出与西方相异的发展倾向。

③ 如文化部所管辖的“文化”种类，恐怕就要比较趋新的“思想史”研究者才会瞩目，即使是博物馆和图书馆一类与“学术”关联密切者也不例外。

同^①。另外，为思想史划分界限的正名式论述迄今少见，即使像葛兆光先生这样“专业意识”较强的通人（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却远不止思想史），也多在思考“思想史的写法”及“什么可以作为思想史的史料”一类问题，其基本立意是希望思想史更开放而非更封闭。

我自己也蒙一些同人抬爱，常被归入“思想文化史”的范围。较广义的社会史论文我曾写过一两篇，那些文字却常常不被认为是“纯正”的社会史。尤其是我曾试图学习从社会视角探索思想史的取向^②，便有不少怀疑的反应；我的学生也曾就此提出疑问，因为他们感觉并未在拙文中看到多少“社会”。这里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我的表述有问题，未能清楚说明我所指谓和尝试的主要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同时也可见“社会史”学界近年厘清其学术畛域这一努力的成功，读者对“社会史”已具有某种预设性的期待，未见其所预期的内容或未闻某种特定“方言”便易感失望。

前面讨论“思想”和“文化”涵盖的范围时已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专门史的划分是否当依据其研究对象而定。上文所说学界关于如何界定社会史的争论，也多少与此相关。这样的问题其实很难说得清楚，更难获得共识。史学各子学科已存在相当一段时期，自有

① 关于西方的“新文化史”，可参见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尽管后者的范围不止于“新文化史”，其中不少内容实际构成对前者的补充。

② 关于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治史取向，蒙文通先生早有示范，参见罗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载《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4期。进一步的学理探讨，可参见 Robert Darnt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in idem,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219-252; Fritz K. Ringer, “The Intellectual Field,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9 (1990), pp. 269-294. 柏克(Peter Burke)近年关于16—18世纪“知识”的“社会史”颇可参考(*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Polity Press, 2000, 此书已有中译本：《知识社会史》，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尽管其讨论的“知识”不全是我们思想史通常处理的“思想”，倒有些接近梁启超和钱穆那两本《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说的“学术”。

其功用甚或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也当注意，这些“边界”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强化的。根本是史学本身和治史取径都应趋向多元，虽不必以立异为高，不越雷池不以为功；似也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门史的藩篱。^①

边界明晰的学族认同原本不是治史的先决条件，我倒倾向于相对宽泛的从各种方向或角度看问题，而不必管它是否属于某种专门史——思想问题可以从社会视角看（即所谓 social-oriented approach），外交问题可以从文化视角看（cultural-oriented approach），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必须固定从一个方向看。《淮南子·汜论训》说：“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惟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此语最能揭示思路和视角“定于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开放视野可能带来的收获。

“无所不通”的高远境界或不适应今日急功近利的世风^②，且既存知识的范围也太广泛，非“生而知之”者大概只能有所专而后可言精。若不计“治学精神”而仅就“治史方法”言，治史者固不妨有其专攻，倘能不忘还有其他看问题的视角可以选择，境界亦自不同。尤其要避免刘勰所谓“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文心雕龙·知音》）之见，切勿因学科的划分限制了对史料的采用。

不论是侧重原典深入体味还是开放视野广寻他证，关键要看是否在有据的基础上立言、有无自己的研究心得。说到底，今日能见的史料都不过是往昔思想脉络的片段遗存，在此意义上厚重的文本和只言片语基本同质。据说老子曾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③ 治史者在深究前人遗“言”之时，倘能尽量再现

① 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前几年关于“脚注”的专书（*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视野颇开阔，按我们所谓专门史的划分便很难“归类”，却是一本得到广泛认可的佳作。

② 如今学问的程度当下就要证明给人看，以学术为“职业”者都必须面对特定时间之内的升等问题，要向年轻人提倡厚积薄发的高远取向，真是难以启齿，恐怕也只有如陈寅恪所说的“随顺世缘”而已。

③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7册，2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按这里的“言”不必非为文字不可，任何人造物体皆能反映也实际反映了制造者的思想，亦皆其言也。《庄子》中有一段类似的描述，意更幽远，当另文剖析。

立言者之“人与骨”及其周围环境，则其理解必更进一层。^①

※ ※ ※

本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增订本，由于“十论”是遵循丛书的命名，现单独刊印，且文字已发展到二十篇，故更名曰“述论”。全书文字由三部分组成，原《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删去4篇（含附录2篇），另有5篇来自《20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并新增8篇近年撰写的与近代中国史学相关的文章。

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史学的履迹”基本是论述性的文字，接近于通常所说的史学学术史，唯更注重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特别是学术典范、研究取向、发展趋势等面相。其余三个部分多是读书心得，第二部分更多是对学术现状的反思，以及对史学发展可能走向的展望。第三部分则从具体的个案探讨近代史研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倾向，并借以思考怎样从宏观的基本层面和特定面相（如史料解读和史学表述）推进我们的研究。第四部分偏于探索史义，一些篇目或与坊间所谓“史学方法”稍近，然亦不尽同；余则多从外在和内在的不同视角观察和思索史学的基本义旨。

本书最早的文字刊发于1996年，而最晚的则到2013年，不少论题本相关联，论述亦不免有重叠。在这次修订编辑的过程中，尽可能删略了重复的内容，并对其中的一些文字有所改动，包括将一些段落从一文移到另一文。因此，个别文章的篇名也做了更动。

由于职业的原因，最常被学生问及的就是“史学方法”。我其实赞

^① 蒙文通论唐代古文运动之兴说，“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同一时代之事，必有其“一贯而不可分离者”；故“有天宝、大历以来之新经学、新史学、新哲学，而后有此新文学（古文）”。参见其《经史抉原·评〈学史散篇〉》，403页。钱钟书也认为，“言不孤立，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谈艺录》，266页）。大致皆发挥孟子论世以知人的主张，提倡开放视野，以超越于就思想看思想的惯性思路。

同“史无定法”的主张，本不认为有多少可以概括抽象出来的“方法”。^①然为了不致误人子弟，亦不得不对此时有所思。偶有所述，总夹杂着“逼上梁山”之感，盖这类问题很难说思考到勉强“成熟”的程度。自忖才学识俱不足以语此，只能稍引前贤之言以壮声势，并无什么特别“独到”的见解。不过是经验教训之谈，以一个在这条路上先行一段者的资格，对那些已将史学确立为专业的在校学生略献刍荛，希望后来者或不致重蹈覆辙，尽可能少走弯路。

这一愿望能否实现，我自己仍尚存疑。其中一些文字，本是上课过程中从学生的问难中得到启发，但不知是否真能针对他们的需要，很希望得到年轻学人的批评。若本书后面的议论幸能引起方家的不满，进而“愿把金针度与人”，为青年学子写出真正有助于治史的方法论，那就是本书额外的收获了。

2013年12月26日于旅京寓所

^① 不过，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特别是其中的《治史经验谈》。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我对自己的学生就首先推荐此书。且此书篇幅不甚大，尤宜备于手边，不时温习揣摩。不仅初学者，以我个人的经验，已任教授者也不妨多看看，必有所获。然此书出版已数年，从刊物上的史学论文和高校的学位论文看，似乎许多人并未受其影响。不知是否因今人喜好虚悬空论，故不欲读此类书？或者今日国人母语水准大逊往昔，以严先生这样平实的文风，竟然也读而无多收获？若是后者，不妨“学而时习之”，渐渐读出“感觉”，即有所得了。

目 录

引言：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	1
一、图书分类与教学分科	2
二、区分“学理”和“致用”的尝试	8
三、国学可否例外或“独立”？	11

史学的履迹

《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21
一、《山海经》在清代学统中的沉浮	22
二、民国学者对《山海经》的不同认知	29
三、余论：学术传统的中断与更新	35
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	42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54
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	84
前瞻与开放的尝试：《新史学》七年（1990—1996）	98
一、办刊取向与栏目形式	98
二、新领域、新视角与新诠释	106

反思与展望

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	121
一、从“对手方”视角看既存近代中国研究	121

二、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128
解读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关于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简单反思	136
让思想回归历史：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点反思	147
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开放型新史学	159
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	181
一、近代中国的变与不变	182
二、学术传统的中断与传承	190
三、前后左右治史：史料与理论的互补	195
四、见之于行事：浅议史学表述	204

研讨的取向

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	211
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	221
知常以观变：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	226
一、充分认识五千年之大变	227
二、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	231
三、余论	235
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239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记忆中的断裂	241
二、历史的“再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	243
三、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255
陈寅恪的史料解读与史学表述臆解	262
一、史料与历史诠释	263
二、史料与表述	270

史义的探索

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旧文新解二则	281
学术“对手方”与专业知识的建构——傅斯年先生的启示	295
往昔非我：训诂、翻译与历史文本解读	304
一、引言：郢书燕说的启示	304
二、训诂与翻译	307
三、观空与观时的互动	315
相异相关的往昔：史学的个性与通性	326
一、历史的“不共相”：承认往昔的独特性	328
二、个性、共性与通性	334
三、小结	343
非碎无以立通：试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	345
一、言有枝叶：直面历史的断裂和片段特性	346
二、以碎立通：收拾一地散碎的文辞	352
三、余论	358

引言：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

张光直先生前些年在关注“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这一问题时提出，由于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经过“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特别是“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① 不过，相当多近代中国学人与张先生的取向恰相反，以西方观念为世界、为人类之准则并努力同化于这些准则之下是他们普遍持有的愿望，并为此而做出了持续的努力。

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大约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应该说明的是，西学本身也是发展的，且西方在近代以前似也不那么注重分科，今日尚遗存的早期学问如“经学”（Classical Studies），便颇类20世纪前期中国所谓“国学”，实为一种以文字为基础的综合性学问，而今已衰落的欧洲“汉学”也正有西洋经学的特色。^② 直到今日，这

* 本文在第五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互动”学术研讨会（泉州，2002年10月19—21日）上陈述时，先后承李明辉、黄俊杰、李弘祺、张西平先生指教，谨此致谢！

① 张光直：《连续与断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见《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集，131～14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另见徐莘方、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载《燕京学报》1999年新6期（1999年5月），8～16页。

② 季羨林先生在讨论什么叫“文史”时说，“它同我们常讲的‘国学’，外国学者所称的‘汉学’或‘中国学’几乎是同义词”（季羨林：《文史天地广阔无边——代发刊词》，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月21日文史天地版），便是于此深有心得的见解。

类西方“旧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区域研究”这类新学也还半独立于“常规”的学术分类之外，通常的专业或学科排名之中便不包括此类学科。

梁启超在1902年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①这已暗示出中西学术分科衔接的困境。特别是在西学分类被尊崇为唯一“正确”或“正当”的体系后，只能是中学适应西学，也就只能是所谓在传统之外改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这更增添了中学分类的困难。且怎样处理既存学术与新确立的学术分类体系的关系，直接牵涉到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敏感问题，不仅偏于守旧者无法回避，趋新一方也尤其关注。

相关的思考在20世纪的中国是持续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两次关于国学与汉学的跨世纪争论直接与西方学科分类在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逐步确立以及中国学界的调整与因应相关——不少学人在因应时发现，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歧异，有些既存的研究对象或治学取向似不那么容易转换并融入新的分科体系之中。本文简单回顾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希望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论争的学科背景。

一、图书分类与教学分科

中国先秦时代学在官守，学问趋于致用。既为用而学，自重专门，故有“学了无用，不如不学”的主张，所谓商人不必知书、士人不必习武（此大体言之），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在实用层面，“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春秋是个过渡时代，孔子的学生已是六艺皆学，然尚各有所专，故有孔门四科之说。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

^①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①，且逐渐形成重广博而尊通识的学风，“博学”长期成为以学术名世（即读书不仅为做官）的士人长期追求的境界，更产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观念。

此后两千年，中国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虽然也不时有主张分治者，但皆未得到普遍认可）。钱穆曾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②在这样一种世风学风之下，读书人对各种学问多兼而治之，但以经学（及其在各时代的变体）为主^③，离此而专治他“学”的，历来少见，唯宋代或稍例外，曾出现治史学者与治理学者争胜的情形，即所谓“评世变者指经术为迂，谈性命者诋史学为陋”也。^④

总体言之，古人治学既然不提倡“分科”，也就很难产生将学术“分类”的社会要求。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学术分类日见注重，主要受到重视分科的近代西学的影响。今日“赛先生”意义上的“科学”，早年多译作“格致（学）”，那时人们说“科学”多指“分科之学”及“分科治学”之意。这样的“科学”当然也具有新意而属于新学，却与

① 参见谭嗣同：《报贝元徵》（1895年），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2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常识与教育》《论诸子的大概》，见陈平原选编：《章太炎的白话文》，54、72~79、100~101页，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

②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见罗联添编：《国学论文选》，4页，台北，学生书局，1985。

③ 这里为讨论方便，仍以后人习用的“经学”这一称谓。其实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言，“经学”作为一种学科的确立也较晚；秦汉所设博士，便不尽以内容分类，而是注重“家法”。

④ 引文见《玉海》卷49，转引自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198~199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关于宋代史家的独立学科意识，参见蔡著118、192页。按：宋代的经学史学之争与当时政争有密切关联，故史学的独立意识部分也受政治影响。参见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见《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317~318页，成都，巴蜀书社，1995。

后来和“赛先生”画等号的“科学”有相当距离。^①自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并逐渐确立正统地位后，中国人对自身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曾出现治学趋于专门的倾向，傅斯年注意到：“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②这就是说，桐城派兴起之前清代经学和史学已出现专门的趋势了。但学术应该分科以成“科学”的概念，大致还是近代西潮东渐以后的事了。

西潮的冲击支持了中国学界内在的专门倾向，晚清时便有像薛福成这样的读书人主张建立专精的学问。^③章太炎在20世纪初年更特别看重当时分科意识的增强，他说，“近来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学人乃逐渐树立为自己求知识的心，“晓得学问的实际，不专为致用”。^④而前引傅斯年对桐城派的批评，已是后来分科意识进一步强化之后的观念。其实桐城派在强调“缺一不可”的同时，先已承认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类学问的存在，到底还是某种分科意识的表现。

①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3期；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见《汪晖自选集》，221~22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②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见《傅斯年全集》，第6册，22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有意思的是，傅斯年的同学顾颉刚在1923年却认为，“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界看各种行业、各种学问、甚至至于各种书籍，差不多都是孤立的，可以不相谋，所以不能互相辅助以求进步”（顾颉刚：《郑樵传》，载《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4月，315页）。两人的看法适相对立，中国学问既不“专门”而又“孤立”，且都造成不“发达”或不“进步”，两方面或皆可举出一些例子，到底还是有点矛盾。其实他们可能都是以西学为坐标在进行对照，“专门”要像西学那样分科，相通也要像西学那样有“系统”。

③ 参见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7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④ 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见《章太炎的白话文》，54页。